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19.02.014

# 用词汇史鉴定法断《远游》非屈作之问题种种

——兼论神仙思想屈原时无或尚未流行说之非

力 之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认为《远游》非屈原作“最坚”之一大证明,即有些术语、词汇与作品所体现之神仙思想为屈原时代所无或尚未流行。然持是说者不仅未能跳出研究对象来考察问题,而且事实上既误以今存文献为当时之全部,又忽乎反证——公认可信的存世文献是否存在着一情况?因之,是说无论如何都无法动摇“《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说。就通常意义言,用词汇史鉴定法来断《远游》非屈原作,应是客观而无懈可击的,然此实似是而非,经不起如何推敲;而以神仙思想为屈原时代所无或尚未流行来断《远游》非屈原作者,其失部分类此,部分则缘未能发掘好《楚辞》内在之证明所致。

**关键词:**《远游》;屈原作;整体观照;词汇史鉴定法;适用度

**作者简介:**力之(1956—),男,广西北海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古文学与文献研究。

**基金项目:**广西特聘专家专项经费资助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9)02-0092-07      **收稿日期:**2018-06-16

《远游》中果真有些术语、词汇如某些学者所说的非屈原时代所有,其所体现之神仙思想果真屈原时代尚未出现或尚未流行,则其非屈原所作决矣。即这无疑足致“铁证”之效的。然而,我们如何能保证这样考察之前提没有问题。即从这一角度考察,首先须弄清楚影响本研究之因素有哪些?笔者认为,其最关键的是应充分地注意以下三点:

一,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屈原其前其时之文献能否保证这一考察结果的“可靠性”(准确地说明问题);

二,除《远游》外,屈原作品与《史记·屈原传》等传世而涉及屈原的文献,其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屈原之种种——生平与思想之全部必如此,而绝无类《远游》所写之内容者;

三,《楚辞》中的代屈原设言之作,其何以多有类《远游》那样之“仙人”概念、求“仙”用语与相关之“仙话”。

于此,如果这三方面(尤其是前二者)的问题解决不好,“必然”便会变为“或然”乃至适得其反而成误判之“坚证”。因之,没有注意到这三方面的问题,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不幸的是,向来从以某某见于《远游》而不见于屈原其前其时文献切入来推断其作者必后于屈原之研究者,似均没有做这一前提性之工作。而由于学界普遍地忽略了这样的前提性工作之不可或缺,故往往以似是而非者为是。下面,再分别究之。

## 一、“用汉语词汇史鉴定古籍时代的方法”所得结果缺乏应有之可靠性

“用汉语词汇史鉴定古籍时代的方法”<sup>①</sup>来证明《远游》非屈原作而是汉人作之用力最勤者，当推已故学者何金松先生。其《〈九歌〉中的非屈原作品》有云：

考证《楚辞》篇目的作者，前人仅仅以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句子因袭等富有弹性的因素为据，这是不够的。在没有获得出土文本的实物证据时，从所用文字、词汇、词义史的时代特征分析判断便成了重要的方法。杨伯峻说过：“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真伪以及它的写作年代应该是科学方法之一。这道理是容易明白的。生在某一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活动不能不以当日的语言为基础，谁也不能摆脱他所处时代的语言的影响。”我着重用这一方法考察《九歌》十一篇作品，认为《东皇太一》、《少司命》、《湘夫人》、《礼魂》非屈原所作。<sup>②</sup>

仅从逻辑的层面上说，用这种方法考察所得应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由于这一“汉语史”是由极小部分建构的，故很多时候由此入手探究之结果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不仅如此，弄不好乃至造成“错案”。如何先生“着重用这一方法考察《九歌》十一篇作品”，而“认为《东皇太一》、《少司命》、《湘夫人》、《礼魂》非屈原所作”，便是十分危险的。易言之，何先生这样所定之“案”恐均有问题。就《远游》言，其举“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之例，而说：

屈原以前的文献和以后的《荀子》、《韩非子》中都没有“菲薄”一词。《辞源》、《汉语大词典》“菲薄”条都用《远游》这句作为最早例证。……王逸注：“质性鄙陋，无所因也。”金开诚等《屈原集校注》：“这里指屈原欲效法神仙真人，轻身飞举，云游四方，但自己却是俗骨凡胎不能遂愿，因此说‘质菲薄’。”《离骚》明明写着“溘埃风余上征”，怎么又说自己体质不好，俗骨凡胎，没有依靠，“焉托乘而上浮”呢？屈原不可能写出此等自相矛盾的诗句，说明作者是另一个人。<sup>③</sup>

由“都没有‘菲薄’一词”与“最早例证”云云，说明不了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能说明的，恐只是何先生于此思之未密。首先，其忽略了这么一个大前提，即屈原以前与其时文献之大部分已亡佚。因之，就现存文献来考察，是证明不了屈原时代没有“菲薄”一词的。《辞源》《汉语大词典》“作为最早例证”者，只不过是当日留存下来甚少的一部分文献之“最早”，而断非屈原时代全部文献之“最早”；其次，由于不同地域用词有异，故屈原所用之词，《荀子》《韩非子》未必用（荀子晚年虽居楚国，然与屈原这样地道之楚人用词习惯自然有所异）；其三，学者与诗人用词本来多有不同，而荀子、韩非子之与屈原即有学者与诗人之别；其四，象屈原这样极富创造力者，某些词最初出自其作品，毫不足怪。即如周策纵先生所说的，“我们怎么能断定这辞汇不是恰好初次用于这一资料呢？”<sup>④</sup>

总之，如众所周知的，屈原创用过的文献而今尚存者少之又少。我们由这尚存的极少部分文献，如何能证明那大多数失传者无？<sup>⑤</sup>何况，在汉人东方朔、刘向、王逸等均认为《远游》为屈原所作之前提下。这本来不过是常识，然学者们却往往忽之。下面，为进一步说明问题而又能简要，引金荣权先生认为“《远游》非屈原作品”之第7条理由——“《远游》中出现的一些人物、术语、词汇，非屈原时代所有，而是秦汉的产物”的第二、三段如下：

朱季海《〈远游〉略说——兼评廖胡二家中失》一文，亦列数条，以证《远游》断非屈原所作：屈原与宋玉作品并言“雷师”，而《远游》则云“雷公”；《离骚》言“吾令帝阍开关兮，依阍阖而望予”，《远游》则作“吾

① 何金松：《〈屈诗编年译解〉简介》，氏编著《屈诗编年译解》，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卷首。

② 何金松上揭书，第350页。

③ 何金松：《〈远游〉、〈大招〉非屈原所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④ 周先生接着又说：“我提到这些问题，并不是鼓励学者去顺从陈说，少去怀疑；不过只是要人把‘无征不信’的严格标准也应用到怀疑者和创新立异者的身上，才好平衡起来。但整体而论，我们还宁可鼓励学者善于‘于不疑处有疑’，只是在未严格证实之前，只能当作‘存疑’而已。”（氏作《五四思潮对汉学的影响及其检讨》，林徐典，主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下），中华书局，1995年，第163—164页）笔者认为，这种治学态度是可取的。

⑤ 至于“屈原不可能写出此等自相矛盾的诗句”云云，更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即使如何先生所说，《远游》与《离骚》的两个诗句有“此等自相矛盾”，也是正常到不能再正常之事。此乃常识（亦可参力之《〈远游〉〈惜誓〉均非唐勒所作辨》）。

今天闹开关兮，排闾阖而望予”；“正阳、朝霞、沧阴<sup>①</sup>、沆瀣及餐六气之说，并不见于24篇之赋”。

何金松《〈远游〉、〈大招〉非屈原所作》一文，在研究《远游》遣词造句方面，用功尤多，除采用前人之说外，又增列新的证据，通过《远游》的用词，以证《远游》非先秦时作品。其所增之据主要有以下几事：“菲薄”、“辰星”、“掩”、“大微”、“玄武”、“文昌”、“音乐”等词皆非先秦所有，而出自汉代。<sup>②</sup>

乍一看，朱、何二先生所说，似是。然只要稍冷静一想，便知如上所述，此类说法大有问题。关于朱先生说，在我国文化史上，类“正阳、朝霞、沧阴、沆瀣及餐六气之说，并不见于24篇之赋”的情况并非仅见。如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之“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sup>③</sup>说，便可例之。即可推在昭明太子看来，在全部陶作中，《闲情赋》乃“白璧微瑕”之唯一者。而就屈原以说屈原，仅《离骚》中间“跪敷衽以陈辞兮……吾令蹇修以为理”44句，就有“玉虬”“灵琐”“崦嵫”“望舒”“帝阍”“閼风”“春宫”“琼枝”“蹇修”等，同样亦“并不见于24篇之赋”（详后）。由“云‘雷公’”之异，无法证明真实的情况就是“雷师”之出现必早于“雷公”，而非两者同时。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楚国最高官职称令尹而非“相”，然《荀子》既云“令尹子西”（《非相》），又有“增丘之封人见楚相孙叔敖曰……今相国……”（《尧问》）之说。又，考今存文献，“天阍”除《远游》外，恐要到南朝刘宋时才再见于刘敬叔《异苑》卷七与沈约《宋书》卷十六《礼三》载大明元年（457）江夏王义恭之表文，难道由此能证明《远游》为南朝时之作品？关于何先生说，“辰星”已见《文子·精诚》；《离骚》《九章》均有用“掩”字之句。又如“音乐”，其认为屈原时代无此词，而以《周礼·地官·鼓人》《庄子·至乐》与《韩非子·八奸》之“音声”为例说：“音是唱歌，声是奏乐。战国末改为‘音乐’，用乐字取代了声字。《吕氏春秋·适音》：‘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sup>④</sup>问题是，《史记·吕不韦列传》云：“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号曰《吕氏春秋》。”<sup>⑤</sup>不知何先生与持此说者何以断定此“音乐”必“闻”之其时而非前世——如《孟子·梁惠王上》之“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之“罔罗天下放失旧闻”之“闻”者？等等。当然，朱先生与何先生之置疑者不止于此，然金先生所引已很能说明此二家置疑之情形如何，故不需再一一辨之。

这里，为了更实在地说明问题，笔者拟用“跳出《远游》观《远游》”之法以究之。作为比较，试看公认为屈原作品的《离骚》，其开头至“岂余心之可惩”这一大段之128句（《离骚》全文共373句），便有“苗裔”（2637；9/338）、“孟陬”（786；4/207）、“览揆”（2859；10/357）、“初度”（349；2/620）、“修能”<sup>⑥</sup>（219；1/1493）、“江离”（1723；5/925）、“辟芷”（3039；11/486）、“宿莽”（848；3/1523）、“代序”（170；1/1133）、“迟暮”（3089；10/1236）、“弃秽”（4/1129）、“菌桂”（2672；9/442）、“蕙茝”（9/546）、“猖披”（2005；5/77）、“捷径”（1270；6/651）、“窘步”（2328；8/447）、“幽昧”（1001；4/436）、“皇舆”（1279；8/266）、“踵武”（3003；10/519）、“齋怒”（3600；12/1442）、“謇謇”（2991；11/392）、“悔遁”（7/548）、“离别”（3321；11/885）、“留夷”（2113；7/1326）、“揭车”（1292；6/757）、“芳芷”（9/311）、“峻茂”（3/824）、“萎绝”（2673；9/443）、“竞进”（8/403）、“恕己”（7/507）、“兴心”“追逐”（10/786）、“落英”（2675；9/484）、“信娉”“练要”（2451；9/933）、“颀颀”（3397；12/324）、“结茝”“落蕊”“前修”（356；2/129）、“彭咸”（1064）、“掩涕”（1272；6/647）、“修娉”（219；1/1493）、“鞿羈”（12/214）、“蕙纒”（9/546）、“揽茝”“谣诼”（2913；11/383）、“改错”（5/404）、“追曲”（10/782）、“周容”（506；3/301）、“郁邑”（3493；3/1138）、“侘傺”（201；1/1357）、“溘死”（6/3）、“屈心”（4/28）、“抑志”（6/392）、“忍尤”“攘诟”（1327；6/968）、“死直”（5/150）、“复路”“行迷”（3/902）、“兰皋”（2742；9/629）、“椒丘”（1595；4/1099）、“止息”（1662；5/301）、“离

① 按：“沧阴”，朱季海《〈远游〉略说》兼评廖胡二家中失原文如此。然此非《远游》之词，而是王逸注《远游》“漱正阳而含朝霞”引《陵阳子明经》文（见《楚辞补注》第166页）。

② 金荣权：《〈楚辞·远游〉作者论考》，中国屈原学会编《中国楚辞学》第八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306页。又，需要说明的是，“皆非先秦所有，而出自汉代”说，不尽符合何氏说之意。准确的，当是“皆非先秦所有，而出自屈原之后”。

③ 《南朝·梁》萧统著：俞绍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0页。

④ 何金松：《〈远游〉、〈大招〉非屈原所作》。

⑤ 《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510页。

⑥ 按：在《汉语大词典》中，“脩能”与“修能”、“脩娉”与“修娉”均有别，而这里的“修能”与“修娉”，分别指该书内的“脩能”与“脩娉”。

尤”(11/883)、“芰荷”(9/283)、“缤纷”(2473;9/1042)等 65 词<sup>①</sup>不见于屈原之前之时的其他文献(其中,有 50 词亦“并不见于 24 篇之赋”)。这 65 词中有 38 个同时为《汉语大词典》与修订本《辞源》所收,而均以此作为“最早例证”。其实,《天问》中同样有多个术语、词汇不见于屈原之前之时的文献。不仅如此,考察庄周的《逍遥游》等,情况仍大略如此。由此,不难想象屈原时代文献之亡佚有多严重,而在此背景下,“用汉语词汇史鉴定古籍时代的方法”及类此者来判传为屈原之作——不仅仅是《远游》为“伪”前,当慎之又慎,而须认真细致地做好相关的种种工作。此如跳出研究对象观研究对象、将部分置于整体中考察等等。

于此,若能起朱、何二先生于九原,不知二先生作如何想?<sup>②</sup>而类朱、何二先生这样否定《远游》者尚有多家,然据笔者目力所及,未见有注意到这一层面者。换言之,象朱、何二先生,尤其是何先生这样来否定《远游》,其底气与其说盖因学养之厚与“识”之锐,不如说当是缘乎思之未周,“周”则恐没有这样的勇气了。<sup>③</sup>当然,朱、何二先生均学养深厚者,然那是另一回事。近人张荫麟先生 1925 年在其《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一文中曾云:

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sup>④</sup>

张岱年先生在《我与张荫麟》一文中引这段话后说:

荫麟对顾氏的诘难,实深中肯綮。按先秦古籍,今存无多,周公称“殷人有典有册”,《左传》记载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这些古典俱已失传,《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古籍也大部分散佚,何以证明“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由“默证”而否定古史是不足取的。荫麟说:“顾氏谓尧舜禹的关系起于战国,其所举证据皆不能成立。”这是正确的。时至今日,对于疑古派的贡献及其缺点,应看得更清楚了。<sup>⑤</sup>

两位张先生所说,的然。这甚值得我们辨析《远游》之作者问题时深思。下面,再来辨认为某种神仙观念非屈原时代所有或所盛,从而否定《远游》为屈原作可否能成立之问题。

## 二、关于《远游》所体现之神仙思想屈原时尚无或未流行的问题

晚清吴汝纶(1840—1903)云:

此篇(《远游》)殆后人仿《大人赋》托为之。……屈子所见书博矣,《天问》《九歌》所称神怪,虽阅识不能究知。若夫神仙修炼之说,服丹度世之旨,起于燕齐方士,而盛于汉武之代,屈子何由预闻之?<sup>⑥</sup>

① 此中,括号内的数字用“/”分开的,见《汉语大词典》第一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1993年。前者为卷数,后者为页码);无分开的乃《辞源》1983年修订本(1984年广西第1次印刷)的页码。至于无括号者,表《辞源》与《汉语大词典》均未收。又,复见晚于《离骚》之《九章》者有“江离”“郁邑”“离尤”(《惜诵》)、“宿莽”“萎绝”“缤纷”(《思美人》)、“蹇蹇”“修姱”(《抽思》)、“彭咸”(《抽思》《思美人》《悲回风》)、“鞿鞁”(《悲回风》)、“侘傺”(《惜诵》《涉江》《哀郢》)与“溘死”(《惜往日》《悲回风》)12词;复见晚于《离骚》之《远游》有“代序”“掩涕”“抑志”3词。另外,又见于《九歌》的“灵修”“杜衡”“冉冉”“浩荡”“延伫”“陆离”“菲菲”等7词尚不计在内。另外,由于统计之差异,或许不止“65词”,然无论如何,此均足以说明问题。

② 又,朱先生上揭文之“《远游》之作,实准楚之遗篇,非郢中之旧制,故其称说,多与《淮南》合符尔”说,亦未达一间。《汉书》卷44《淮南王安传》说:“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故《远游》称说纵使“多与《淮南》合符”,仍是无法得出其“实准楚之遗篇”这样之结论的。

③ 张中一:《论〈远游〉不是屈原的作品》,《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等之证明亦如此(朱先生之文写于1984年)。而张先生之证明还远不如朱先生之坚,如其为证明“《远游》……渗透着汉代的时代信息”所说的“如《远游》主人公拜会的‘炎神’本是楚先祖神,先秦时代的楚人称其为‘炎帝’。……到秦嬴政时,自称‘始皇帝’,自此,‘天帝’的地位才开始降格为‘神’”与“‘南疑’不是先秦时代的地名,它是由汉代的‘九疑山’名演化而来的”,便均纯属似是而非。以前者为例:首先,检《淮南子》《史记》《汉书》,多见“炎帝”而无“炎神”;其次,“炎神,一作‘炎帝’”(《楚辞补注》第172页)。至于后者,其同样是缘于牵强附会而来。“南疑”(九疑)为先秦地名乃近乎常识,然张先生却据“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长沙国南部舆图》就是九疑山(南疑)一带的地图,名川大山标得很详细,唯独没有‘九疑’山名,更不见‘南疑’之名”,而说“‘南疑’……是汉代兴起的地名”。

④ 《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

⑤ 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⑥ 周青萍注本:《古文辞类纂》:卷五,广益书局,1947年,第225页。

“后人仿《大人赋》托为之”说断不能成立，然此前笔者已为《〈远游〉考辨》一文辨证之<sup>①</sup>，故兹不赘。至于“盛于汉武之代，屈子何由预闻之”云云，乃吴氏据去屈原二千余年后所见之极小一部分文献作“直线式”之“大”心求证而来，与纯主观臆测无异，显然不可置信。比观我们前面所述，思过半矣（详后）。

又，潘啸龙先生在其《〈远游〉应是汉人伪托屈原之作》一文中驳姜昆武、徐汉澍二先生《远游真伪辩》之《远游》的“神仙思想”“流行于战国时代”时说：

但是，“仙人”的概念，求“仙”的习俗和用语，以及韩众、王乔、赤松子之类“仙话”，在屈原时代却还未流行，更没有表现在杂著、诗作之中。与屈原同时代的庄子，其出世之说可谓已臻“圆备”（鲁迅语），种种仰慕“神人”、“真人”、“至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无端崖之辞”，充斥于一部《庄子》之中。却未有一语说及赤松子、王子乔、浮丘生、韩众等“仙”人。《山海经》历述九州神怪，可谓谲怪、不经之至，亦未有一语涉及上述“白日飞升”的人“仙”。在屈原的所有诗作中，但有“神”、有“怪”，而未见有“仙”，象“赤松”、“王乔”这类仙人，即使在屈原之后宋玉所作的《九辩》中，也还没有出现，虽然《九辩》最后一节也有“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的浪漫主义描写。……飞升成仙之说，萌于战国末期而盛于秦汉之际，故秦汉之际杂著、诗作开始多所称引。直至刘向，更搜罗众说，以成《列仙传》。屈原之时，这种观念、用语尚未流行，更不要说表现于诗作之中了。怎么能断言酣畅淋漓地表现了“轻举”、“登仙”思想的《远游》为屈原所作？屈原的诗作多为“政治抒情诗”，即使援引神怪之物，也用作构思中的象征意象而已。《远游》通篇一无政治寓意，纯为道家宣扬出世、登遐的娱乐文字，这与屈原“发愤以抒情”的创作素志亦不相符。这类作品，只有在秦汉之际神仙、道家思想流行之时，才陆续出现。胡氏判断其为“汉人所作”，是有根据的。上引《远游真伪辩》，力排众议，洋洋过于二万余言，对胡氏提出的证据，惟独不置一辞，却是为何？<sup>②</sup>

此虽是潘先生二三十年前之说，然到目前为止，这方面之研究，其仍甚具代表性而很能说明相关问题。<sup>③</sup>不仅如此，潘先生近年仍引胡氏《楚辞新注求确》与吴氏《古文辞类纂·校勘记》之论为前提，而说：“……判断其（按：即《远游》）为汉人伪托之作，较为确当。”<sup>④</sup>因之，笔者于此引其说进行辨证如下。

首先，以“庄子……未有一语说及赤松子、王子乔、浮丘生、韩众等‘仙’人”、“《山海经》……亦未有一语涉及上述‘白日飞升’的人‘仙’”与“在屈原的所有诗作中……未见有‘仙’，象‘赤松’、‘王乔’这类仙人，即使在屈原之后宋玉所作的《九辩》中，也还没有出现”为据，是证明不了“‘仙人’的概念，求‘仙’的习俗和用语，以及韩众、王乔、赤松子之类‘仙话’，在屈原时代却还未流行”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据《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而今存《庄子》仅“三十三篇”。作为比较，这里拟以后汉初的桓谭、班彪存世之文为例说之。桓谭《仙赋》（《艺文类聚》卷78“灵异部”）与班彪《览海赋》（《艺文类聚》卷8“水部上·海水”）分别有“王乔、赤松”与“韩终”，然两氏的其他文则均无之。即《仙赋》《览海赋》若失，例以“（庄子）未有”云云，人们亦会由此推断桓谭与班彪无“一语说及赤松子、王子乔、浮丘生、韩众等‘仙’人”，从而说这类“仙话”在桓谭、班彪时代“却还未流行”。不仅如此，两相比观，在现存之“屈原的所有诗作中”，仅《远游》出现“象‘赤松’、‘王乔’这类仙人”不同样是正常的吗？再例以“《九辩》”云云，“象‘赤松’、‘王乔’这类仙人”，在汉人王褒（前90—前51）的《九怀》有吗？此其一。其二，略比照《汉书·艺文志》便知，当时文献流传至今者少之又少。何况，经秦朝之“焚”与楚汉之战火，《汉书·艺文志》著录者比之屈原时代之文献，恐更是如此。因之，在上文所说《离骚》第一大部分便有65词不见于现存的屈原之时之前之其他文献（除其中的15词分别见于《九章》《远游》外）这一前提下，如何能仅由充其量是大半部的《庄子》与一部《山海经》来证明“‘仙话’，在屈原时代却还未流行”？当然不止于此，迄今为止，目力所及，似尚无学者注意到这一至关重要之“前提”。问题是，没有注意到这一前提所进

① 见作者《〈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

② 潘啸龙：《屈原与楚文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85—186页。

③ 相关材料，可参《〈远游〉“王从仁解題、说明”，马茂元主编：《楚辞注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1—425页；张松如主编：《中国诗歌史》（先秦两汉），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6—177页；等等。然从认为《远游》所体现之神仙思想屈原时尚无或未流行这一角度看，其均未超出潘先生说之域。

④ 潘啸龙：《楚辞举要》，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

行之考察,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因之,潘先生接着说之“正因为如此,胡浚源指出:‘……何《远游》一篇,杂引王乔、赤松,且及秦始皇时之方士韩众,则明系汉人所作’。胡氏之说,颇有道理”(原作“实为至确”<sup>①</sup>),显然未为知言。其实,胡氏此说未免牵强附会之嫌,实似是而非<sup>②</sup>。另外,这里的“在屈原的所有诗作中……未见过‘仙’”云云与胡氏之“屈子一书……并无一句说神仙事”等一类说法,很容易给读者一个错觉。即或以为《远游》一直都在“屈子一书”外而被认为是“无名氏”所作。同理,朱季海先生之“其言真人、羽人、韩众、王乔又杂方士神仙之谈,皆不见于余制,盖灵均所赋,除古神话所有,无非楚巫所祠,未尝与方士神仙之说相乱,则楚俗贵巫,方士之出盖晚,其始故未能与巫争先也。……《远游》之作,当在方士神仙之谈浸淫曼衍之后,以是言之,非屈原所赋,亦以明矣”<sup>③</sup>说,亦一样显非圆照(详后)。

其次,关于“飞升成仙之说”云云,已有多位学者从出土文献之角度论证其不是问题<sup>④</sup>。其实,这与据今存半部《庄子》与一部《山海经》断“‘仙人’的概念,求‘仙’的习俗和用语,以及韩众、王乔、赤松子之类‘仙话’,在屈原时代却还未流行”,毫无二致。即同样是有失圆照而不能成立的。严耕望先生云:

过去发生的事,只有少数记录下来。有记录的,又未必传世,一直传到现在。而现在保存的记录,自己也未必都已看到。所以个人所知道的、所掌握到的史料都极有限,不能因为自己没有看到可以肯定那件事的史料,就否定有那件事。<sup>⑤</sup>

这是恰切的。这里再举个例子,怀疑《远游》为屈原作者,最早盖为清代中叶的胡浚源,然赵逵夫先生说“至清末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远游》方提出了疑问”<sup>⑥</sup>,陈子展、姜亮夫、苏雪林三先生则说“从廖平始”(“廖平先生始”“第一个人是廖季平”)<sup>⑦</sup>,陆侃如、郭在贻及日本学者藤野岩友诸先生更是说:“(胡适)首先怀疑”(“胡适首先发疑”“胡适首先提出是后来出现的模仿之作”)<sup>⑧</sup>。这六位均楚辞学名家(当然,陆先生其时仅20岁,故不奇怪),按常理,我们可以推说,“吴汝纶方”“廖平始”“胡适首先”云云,肯定不是这些方家之说吗?答案却是否定的(其后知道,是另一回事)。以此例彼,当发人深省。此其一。其二,检全部《楚辞》,言及赤松、王乔诸仙者,仅《远游》及前汉文人之代屈原设言之作。其中,《远游》有“闻赤松之清尘”、“羨韩众之得一”、“吾将从王乔而娱戏”与“见王子而宿之”四处;“或曰”贾谊所作之《惜誓》有“赤松、王乔皆在旁”一处,东方朔之《七谏》有“见韩众而宿之兮”一处,庄忌之《哀时命》有“与赤松而结友兮,比王乔而为耦”二处,刘向之《九叹》有“驱子侨之奔走”,“譬若王乔之乘云”二处。而“赤松”“王乔”(“子侨”“王侨”)与“韩众”之名,却不见于贾谊、东方朔与刘向之其他文中(刘向《列仙传》等书除外)。问题是,如果屈原之时“这种观念、用语尚未流行”,这些代屈原设言之作如何用之?如果《远游》非屈原所作,这些代屈原设言之作如何有之?<sup>⑨</sup>我们能说这都是汉人用汉代才出现或流行之语之事加之“屈原”吗?这只要了解《楚辞》中之代屈原设言之作的性质

① 潘啸龙:《〈远游〉应是汉人伪托屈原之作:〈远游真伪辨〉质疑》,《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② 参力之:《〈远游〉之韩众必先于屈原辨及辨之方法问题》(待刊)。

③ 朱季海上揭文。

④ 如廖群教授说:“在这一问题上,出土文物提供的新的信息是,就文化背景而言,仙道思想已经不应再成为判定屈原有可能创作《远游》的障碍。一方面,燕齐已经流行升仙羽化之说得到了实物的证明,另一方面,也不必再考虑屈原是否在齐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因为楚地也已经有仙道文化流行的迹象。”(氏著:《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学习出版社,2007年,第243页)又,参汤漳平:《出土文献释〈远游〉》,载《中国楚辞学》(第16辑),学苑出版社,2011年。

⑤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⑥ 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28页。

⑦ 陈说,见《楚辞直解》,第623页;姜说,见《重订屈原赋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51页;苏说,见《楚骚新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8页。

⑧ 陆说,见《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0页;郭说,见《近60年来的楚辞研究》(《古典文学论丛》·3);藤野说,见《巫系文学论》,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⑨ 参力之:《〈远游〉考辨》。又,有个别例外者如刘向《九叹·愍命》“韩信蒙于介胄兮,行夫将而攻城”之“韩信”。然个别例外不影响整体性的结论(参李诚:《汉人拟楚辞入选〈楚辞〉探由》,《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者,便一清二楚:不可能。<sup>①</sup>

可见,“只有在秦汉之际”云云,未得其实。况且,“秦汉之际杂著、诗作开始多所称引”说,未达一间:从逻辑之层面看,“开始多”即表明此前已有;“秦汉之际杂著、诗作”所称引及屈原时代乃至更早者不知凡几。而“屈原的诗作为‘政治抒情诗’”说虽近是,然“多”者非全部<sup>②</sup>。至于“不相符”云云之所以未达一间,汤炳正先生《论〈史记〉屈、贾合传》一文及其《楚辞今注》的《远游》【解题】(熊良智初稿、汤先生改定)言之极是<sup>③</sup>;况且“不相符”本不是问题,比观《楚辞》中《七谏》《九叹》等代屈原设言者,便不难明白。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限于篇幅,另文详之,兹不赘。另外,关于“胡氏提出的证据”,本文前面已断之曰:这未免牵强附会之嫌,实似是而非。

### 结语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认为《远游》非屈原所作“最坚”之一大证明,即《远游》中有些术语、词汇与其体现的神仙思想为屈原时所无或尚未流行说,无论如何,均是断不能成立的;至于其他的种种理由更无法动摇王逸之“《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说。

从研究方法的层面上说,认为《远游》中有些术语、词汇与其体现的神仙思想为屈原时所无或尚未流行之前贤时彦,未见有能跳出研究对象以考察研究对象与就整体来考察部分、并充分注意到“秦汉”时之书及诗文而说及屈原时代者往往而有,而多是纯以“部分”的“部分”之所谓“无”来推断全部均无。故此,即使其中之高者所得,亦每每多貌似客观而实为“假象”者,遑论非高者。

[责任编辑 海林]

① 当然,我们知道潘先生有“《楚辞》并无所谓‘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之说,然其同时亦认为:“刘向增辑之时……增辑和自附的《九怀》、《七谏》、《九叹》,不仅体式全采用骚体,而且在内容上多有追悯、叹伤屈原之旨。”(氏作《〈楚辞〉的体例和〈招魂〉的对象》,《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因之,其说并不影响本文此处所论。何况,潘先生之“无所谓”云云,“就严格的学术理路说”应该回答的前提性问题,却“一个也没有回答”(参钟其鹏《关于〈招魂〉体例与所涉礼制问题及其他》,《云梦学刊》2009年第6期)。

② 况且,“《远游》通篇”是否如潘先生说的“一无政治寓意”,尚是一大问题。

③ 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汤炳正,等:《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79—180页。又,亦可参力之:《〈远游〉〈惜誓〉均非唐勒所作辨:与赵逵夫先生商榷》(《〈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第106—110页)。另外,吴冠文在其《论宓妃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演变》中,引《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至“固前圣之所厚”一节文字后,说“由此可见,他在‘政治失意’之后仍然坚持他的理想和原则,决不屈服与妥协,还发出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这样掷地作金石声的誓言……所以,《远游》中的‘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的精神状态,决不是《离骚》中的屈原当‘政治失意之际’所能产生的,也许这种前后思想的变化,在‘历史人物中比比皆是’,但决不适合于写出了《离骚》的屈原”(梅新林等编《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1—372页)。即否定汤先生等的《楚辞今注》(《远游》【解题】)之说。然笔者认为,即使退两步,吴说仍是不能成立的:一,就背景言,“东方朔‘追愍屈原’的《七谏·自悲》……已化用《远游》中相关意象”(吴冠文上揭文;同上,第373页);二,从时间上说,两者作时不同;三,《离骚》之“固前圣之所厚”后,尚有“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诸语,即吴先生这里所用的乃“抽样作证”之法。